



讲堂聚焦

文汇讲堂听众组团出席清华 EMBA 公开课——

互联网金融时代，谁是赢家

5月15日下午，52位文汇讲堂读者库听众受邀出席清华EMBA公开课——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张陶伟教授主讲的《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开发》。文汇讲堂工作室作为该活动的支持单位，不仅输出了优质听众，更为讲堂听众提供了与名校名师零距离切磋的平台。

互联网金融到底是什么？互联网金融目前的生态系统如何？互联网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张陶伟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们正在思考及迫切寻找答案的问题。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核心是互联网思维

目前，不断涌现的各种互联网金融产品、饱受质疑的线上P2P平台、呼之欲出的央行管理条例……，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时兴的理财渠道已悄然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热议话题。

究竟什么是“互联网金融”，业界和学术界尚无明确的、获得广泛认可的定义，张陶伟给出的解释是：互联网金融是一种借助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和信息中介功能的新兴金融模式，其本质是金融，其核心是互联网思维。以羊年春节的“微信抢红包”为例，当晚10点半央视春晚“送红包”，后台大数据显示，微信“摇一摇”共72亿次，峰值每秒8.1亿次，送出微信红包1.2亿个，仅仅两天时间，微信绑定个人银行卡2亿张，这是支付宝要用8年才能完成的数量级。微信红包一夜之间成为了互联网营销的典范。张陶伟认为微信红包的制胜之道在于“互联网思维”和“金融本质”的无缝链接，互联网思维将人性、关系、金钱、欲望带入了送红包的“游戏情境”，从而造就了这一金融游戏的盈利点：低成本一举多得——用极低成本的身份认证，利用客户自己的钱发红包。

用互联网思维的方式及工具，找到连接与聚合盈利模式的方案就是“卖点”，让人欣然接



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张陶伟教授的讲课案例丰富，生动实用
②文汇讲堂与清华EMBA上海办公室自去年8月起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③5月15日，文汇讲堂为清华EMBA百人公开课——《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开发》输出了52位读者库听众

受、趋之若鹜就会引发“爆点”。张陶伟认为，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爆点”已然触发。

开源、节流、风控是互联网金融企业的生存法则

为何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出现了井喷式发

展？张陶伟认为，在我国，管制、互联网、金融构成了“中国特色互联网金融”的三原色。“管制+互联网”为百度、微信等带来了竞争优势；“管制+金融”将传统金融行业推向了垄断地位；“金融+互联网”才是美国式相对成熟的互联网金融的核心要素，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主动结合比较早，也比较积极，这是正常的竞争使然。然而，我国目前的互联网金融产生井喷现

象，原因之一在于我们的金融服务整体相对落后，社会对金融服务的总需求日益增大，但总体服务不足，井喷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经济现象。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到位、市场投融资渠道的多样化，目前的喧嚣声会逐渐平静下来。

台风来了，猪都会飞，潮水退去，谁在裸泳？很大比例的中国互联网金融参与者正处于“瞎子摸象”的混沌状态。大浪淘沙后，所有存活下来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长期而言必须满足金融的逻辑本质：开源、节流、风险管理、风险收益匹配原则。即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价值来源在于增加收入、降低成本、和控制风险，没有良好风险控制

学习能力是个人和企业经久不衰的核心竞争力

讲座尾声，张陶伟提到，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不仅在营销方式、营业平台、授信审查、风险管理、支付结算上有着巨大差异，更是一种思维变革和模式创新。传统金融行业强调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这“三性”，而互联网金融中的互联网基因却激进创新、强调灵活、便利的用户体验，这有悖于传统金融追求稳健的原则，两者的价值观存在冲突碰撞。

如何缓解这一矛盾，学习的心态可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例如，传统金融可向互联网金融学习服务体验，反之，互联网金融也应学习传统金融的风险控制能力。

对于一个企业或个人，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学习能力。学习能力越强，应对未来变化的时候就越主动，价值就越容易得到提升。眼界决定了战略高度，战略高度决定了思路，思路决定了企业出路。抱着学习的心态拥抱互联网金融领域，见证、亲历这一变革，没准你就是赢家。

(文汇报记者 刘晓晨)

(上接第2版)在2012年出版的《中华文明的根柢》的序言中，姜义华写道：“中国之所以崛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志士仁人都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根柢。”姜义华所说的文明根柢，在其书中指的是“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家国共同体的经济、社会结构”，及“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民族精神”。除了三大根柢，他还总结了四项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此书推出之后，有些年轻读者不以为然，觉得只是应景之作，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反思对于一个曾经对传统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老人而言究竟有多不易。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与时俱进。姜义华说，会对中华文明得出这样的认识，连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它和我往昔所崇信的要同传统彻底决裂的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

事实上，在研究章太炎、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人物的思想时，姜义华就发现，他们也曾经激进地宣称要告别传统，激进地把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然而到最后，他们竟然都选择了回归传统。姜义华认为，这既不是思想的倒退，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他更愿意将这种转向称之为“中国启蒙运动的再出发”。

从1980年代恢复工作以来，姜义华就从未停止探寻文明根柢的步伐。他率先创办了文化史研究的专门刊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并召开了首届

中国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来参加的有后来的主席江泽民。1990年代，他又协助萧克将军主持编纂了100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带领着近200多人的专家队伍，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沿革等作出全方位的概述。此书出版后曾被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如果对我们自己的文明缺乏自信，其他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不用谈了”。

现代化中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姜义华对传统的反思也让他开始重新思索何谓现代化，中国又应该如何通往现代化。在谈到对现代化的理解时，姜义华毫不讳言早年的“狭隘”：“我们这一代人，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对现代化的理解特别简单，觉得现代化就是工业化，就是农业机械化”。

在为青年学子编选海外学者中国文化论著时，姜义华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和了解海外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内涵，“现代化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快捷和容易”。姜义华开始觉得，现代化更是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除了工业化，它还包括诸如市场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社会中产化、政治民主化、国家法治化等诸多议题，现代化应该是全方位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自身是否实现了现代化。

“换句话说，就是人是否具有现代性的问题。”姜义华言及的现代性包括很多方面，诸如现代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公众意识等都是现代性

的题中之义，“现代性的核心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的尊严，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价值、自主、权利和发展。看似老生常谈，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容易的。”

姜义华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说到底还是农民问题，在他的《挑战中国：现代性三重奏》中，姜义华提出中国在转型中所要面临的巨大考验，就是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他指出，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近代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农民出力，然而他们的各种权利却缺乏保障。“农民应该成为现代化中的重要动力，但同时农民也应该从现代化中得益。”

为了更好地研究现代化，在姜义华的倡议下，复旦大学于2001年成立了“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这个研究机构整合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下设“上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研究室”、“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室”、“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室”、“比较文明与比较现代化研究室”四个研究室，此外，还创办了自己的刊物——《近代中国研究集刊》。

除了形成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研究团队，承担着国家、教育部等多项重大课题，该中心还十分注重对外交流，成立至今，已经举办过多次高层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外，作为中心主任，姜义华还注重年轻学者的支持与培养，2006年由他编定出版的《革命与乡村》，收录的都是讨论土地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变动的博士论文。

近两年来举办的诸如“医家、病家与史家——以

医患关系为中心”“看图说史：近代中国的身体、政治与视觉再现”等工作坊则是由系里一批紧跟海外文化史、医疗卫生史、图像史、知识社会史等研究潮流的年轻老师发起的。

在姜义华看来，这个研究中心就是一个平台，他只是希望自己能够和他的团队一起，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所贡献。

现在的姜义华，除了做学问，他还坚持每学期都给硕士生开课。每个周一早上的八点半，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光华楼西主楼的1801。在回顾他五十多年来的复旦岁月时，姜义华有时候他会嘲笑自己过于“书生气”，因为太“书生”，在别人都意识到问题，但都选择沉默的时候，他却勇敢地发出他心底里最真诚的声音。

很少有人知道，姜义华还喜欢写诗。在因为讲真话而受到批判的时候，他写下的是“攀登峻岭有荆棘，浮沉沧海多悲风。愿作清溪流不竭，纵横阡陌润新种”；在再次因为指出问题而遭受不公平待遇时，他依旧吟出了“日暮山却秀，天寒气益清。《春秋》一卷握，道遥评古今”。

在姜义华看来，为人与治学是一致的，不管是为人，还是治学，都要有“敢为天下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他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姜义华寄语复旦的学生，复旦要真正出人，出有思想的人，就要有胸怀有气度，要敢于留下一批有棱角也许思想不太成熟的人。作为“书生”，做好学问只是本分，他还应该有一定的家国情怀。